

从办学理念看柏林大学改革与北大改革的相异点

陈 晶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德国柏林大学继承中世纪大学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理念并发扬光大,尤其是费西特、施莱尔玛赫、洪堡等人对柏林大学的改革更是对后世的近现代大学影响深远。蔡元培模仿德国模式改造北大,这就是中国的近代高等教育的一个典型例子。德国大学观对北京大学改革的深刻影响虽然带来了两者的相似性,但其差异性更是明显。本文试图从两者的办学理念、在办学理念的侧重点和主要倾向上的不同点以及两者对世界的不同影响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两者改革的相异点,以此能给予我们更大的启示。

关键词:柏林大学;北京大学;洪堡;蔡元培;纯粹科学;主观教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863(2005)03-0054-04

众所周知,德国柏林大学继承中世纪大学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的理念并发扬光大,尤其是费西特、施莱尔玛赫、洪堡等人对柏林大学的改革更是对后世的近现代大学影响深远。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在西学东渐的大规模文化迁移的过程中诞生,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西方及日本的影响,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许多创建者也是外来观念的中介人。蔡元培无疑是这批创建者中的佼佼者,他在北京大学六年,模仿德国模式改造北大,使北大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德国大学观对北京大学改革的深刻影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两国当时的具体背景及文化思潮出发,两者在办学理念的着重点和主要倾向上还是有较大区别的。

一、柏林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办学理念

费西特、施莱尔玛赫、洪堡三者都是创办柏林大学的先驱和功臣,柏林大学的创建体现了费西特、施莱尔玛赫等的思想与精神,而它的实践则是由当时的教育大臣洪堡来完成的。因此它的办学理念主要是根据洪堡在《柏林高等学术设施的内部与外部组织理念》一书中提出的近代德国大学的办学方针和理念来确定的。对于新大学的办学理念,洪堡首先强调,新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Wissenschaft)与主观的教养(Bildung)相结合”。^[1]也就是说,新型大学应该是保证学生通过探索纯粹的客观学问获得教养的机构。关于如何在大学里开设客观纯粹学问或科学,受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颇深的洪堡反对传统大学中的神学、法学和医学教育的职业性

和功利性,却愿意继承中世纪大学初期的学者自治和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次,洪堡强调,上述知识主要不是由传统的教师讲授方式来传授,而主要是由学生通过学习和研究与纯粹理性认识有关的哲学知识等获得。在这一前提下,洪堡提出了大学理应保持“孤独和自由”的原则。即是要求无论是大学学生还是教师或是研究人员都应该自觉地与世俗社会和功利主义教育价值观保持一定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大学还必须摆脱国家和教会的控制及来自工业社会的世俗压力。在这一基本理念的指导下,洪堡强调,在新型大学中必须将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统一。为此,他具体提出了大学“学习自由”和“教育自由”的两条基本办学方针。综上所述,洪堡提出的办学理念可以具体表述为“通过学习和研究客观纯粹科学或学问实现主观教养”,“孤独和自由”是实现这一理念的前提条件,“教学和研究相结合”是基本办学原则。

相对于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由洪堡综合多个思想家的思想而形成的办学理念来说,在北京大学改革中,主要是由蔡元培提出自己的办学理念并予以执行,他的办学理念概括起来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际上,蔡元培在北大六年,就是仿照德国大学模式来改革北大的,也就是说他曾深受洪堡、费希特、施莱尔玛赫等人的影响,才提出与柏林大学极其相似的办学理念,但是鉴于蔡元培是学贯中西文化的大家,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的各种教育学说和教育制度、方法,他都能依据当时本国需要,兼采所长,“食而化之”,所以

收稿日期:2005-05-12

作者简介:陈晶(1980-),女,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说,他的办学理念与柏林大学的办学理念仍有差别。所谓“思想自由”是指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蔡元培主张“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2]他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无原则的混合杂凑,而是认为大学应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泛吸收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这也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办学理念的重点所在。

二、二者办学理念的侧重点及其不同的原因及背景

很明显,从二者办学理念的涵义和重点所在可以看出,二者虽极其相似,但着重重点仍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我们看到柏林大学的建立不是洪堡一个人的思想在起作用,而是当时的当权者集多个思想家的思想于一体,并交由洪堡来具体实施的。而且洪堡本人也曾受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至深,因此他创立大学所依据的精神和道德准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前人先期的设想,这种对多个思想的综合就必然存在有选择性地保留和继承,同时在宣扬这种理念时必然会有侧重点。费希特曾认为大学应该是“科学地运用理智的艺术学校”。他对让听众在其中完全持消极态度的教学实践提出批评,要求“把阐述的、解释的内容转变到生动的、活泼的认识中去。”此后建立的柏林大学就是一所旨在扩大和介绍科学认识而不是旨在进行职业教育的大学,这无疑是在吸取了费希特的思想。施莱尔马赫主张思想自由和思想独立,要求学生必须对最高知识的统一性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这一点上洪堡和他一样,认为大学教育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认识。因此必须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使他们独立地深入到科学当中去。所以从一开始,柏林大学的创办就把重点放在了“教学自由”以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上,即此才是它办学思想的核心。洪堡还着重强调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三者相统一、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科学统一的原则,反对国家干涉大学的学术自由,认为国家应从长远利益的角度来看待大学使命的完成。洪堡不仅提倡学术自由,且曾强烈要求国家不再干涉大学。洪堡的这种要求大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的主张恰与施莱尔马赫的大学观相一致,却与费希特要求国家对大学施加各种影响的想法截然相反。但最终结果,建立起来的柏林大学因为当时所处的背景以及当权者的意愿不得不使其与普鲁士紧密而牢不可破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使洪堡最终相信办大学是国家的职责。其实这并不以为奇,在民族主义复兴、国家权力日渐扩大的时代,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大学是不可能生存的,况且大学还需要仰仗国家的财力和资金。可是也确如洪堡、施莱尔马赫所提出的那样,大学发展又有其自身的规律,过分的行政干预只会适得其反,扼杀大学的活力。

在这一点上蔡元培与洪堡、施莱尔马赫是不同的,蔡元培作为前清翰林,看到大清的末路,毅然放弃功名利禄,投身革命。他对教育事业的关注一直以来就是与他的民主革命活动紧密相联的。他所说的从教育着手,既包含对国家富强的殷切希望,也指对已濒临绝境的民主共和事业的挽救,为此而从事启迪民智、培育人才,这也是民主革命事业的一个

重要方面。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无论是柏林大学的创办,还是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最终的途径都是利用教育来挽救国家危亡,但两者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明显是不同的。洪堡认为学术是很纯粹的,反对实用主义的观念进入学校,只主张大学从精神上来支持国民和国家的发展。正如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所说“国家必须通过精神力量来补偿物质方面的损失”。^[3]而蔡元培从一开始的确也有模仿德国大学之意,但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很快转变观点,希望学术的发展能最终转化为实际成果应用于现实社会,而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始终认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经验和制度时,要根据本国实际,他曾说“从原理上观察,可行则行,不必有先我而为之者”,这也反映了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

正是因为东西方的文化渊源不同,所以从两者提出的办学理念的哲学依据出发来看,柏林大学所体现的教育哲学更注重强调全面和谐发展的个人,即个别性,这显然是受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颇深而致。而蔡元培则是依据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观——儒家思想来改造北京大学,他主张教育要超越个人,达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个人”的境界,即群体性也就是社会性。这很显然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他的民主革命事业是分不开的。同时他也吸收了康德哲学的本体论观点,为加强他的上述思想,他要求人最终能进入本体世界,化为它的一部分;而以洪堡为代表的改革者们则构造了一个观念的世界全体,要人们能认出它的种种表现形式,接受它,领悟它。这种深刻哲学上的不同,可以部分表现出两所大学改革所依据的教育哲学观的不同。

其次从当时两国所处的背景来看,19世纪初的德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不过这种民族的觉醒还只是限于文化领域。1806年普法战争,普鲁士战败,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开始转化成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在这个民族濒临灭亡之际首先是费希特、阿恩特、施莱格爾等文人学者号召抵抗拿破仑的入侵,鼓吹爱国主义。费希特的演讲《告德意志国民书》更是极大地震撼了德国人的心灵。可以说文化学者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政治上积极措施的采用,当时的德国由上至下开始了一系列地挽救国家命运的改革,当然也包括其中一环——创建柏林大学。在洪堡实际开始创办柏林大学之前,经过18世纪两次大学改革运动,以哈勒和哥廷根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已取得巨大的成功,使得学术自由和注重科学研究与现代科学成为德国大学的优良传统,因此可以说在这方面很显然柏林大学办学理念之一就是对这个优良传统的继承。这是其一,其二在于,当时二种思想的斗争,一是功利主义,另一是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大学改革方针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在实践中也分别对德国各邦大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与新人文主义者所具有的高深思想相比,由于功利主义者所表现的理性主义的“肤浅”特征,常常在德国大学发展史上受到轻视。在这种情况下,新人文主义的思想观念占了上峰,并积极地影响了洪堡和费希特等人。在新人文主义者看来,大学的任务就

是培养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即所谓有教养的人,主张学习古典科学时,不仅学习知识更要学其精神,这成就了洪堡所强调的办学理念即新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Wissenschaft)与主观的教养(Bildung)相结合”。

而20世纪初的中国同样处在新旧制度交替的特殊环境中,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打破了天子的无上权威,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促进民主精神的高涨。当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不仅使任何帝制复辟的图谋都不可能成功,而且为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仍然有人妄图复辟帝制,在文化教育思想领域里,重新掀起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北洋军阀集团的代表人物袁世凯。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就开始实施他的复辟计划。他大搞祀孔祭天,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主张尊孔读经。这个时候的北京笼罩着强烈的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的氛围,虽然后来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但是却给北京、北京大学留下积习,北洋军阀集团的继任者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状况。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了。我们认为,蔡元培的办学理念中着重强调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完全是为借鉴德国而借鉴德国的。他的这种理念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我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所提出来的。袁世凯的复辟风潮对当时的国民的思想起到了一定的束缚和钳制作用,这对当时初建立起来的民国极为不利,针对这股复辟“尊孔”之风,蔡元培的思想自由的理念就找到了很好的载体。在这一点上来说,两者之所以重点的不同的确事出有因。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两所大学最终对于学与术的态度。柏林大学从建校初直至今日,一直坚持学与术是分开的,它提倡纯粹的学术而摈弃了学术应该实用的那一面,但是后来实用主义却绕开了柏林大学而在德国其他性质的学校里取得了成功。当今的德国十分注重培养技术人才,它所培养出来学生具有明显的技术特长,可见实用主义在当今的德国是成功的,因为它必竟符合实际社会发展的需要。北京大学对学与术的态度是先从学与术分家,后针对实际认识到学与术应该并重而转变其态度。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暇顾及我国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使我国民族工商业赢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这时工商业的大力发展使当时中国的经济有较大发展,同时也壮大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队伍,蔡元培作为其中代表人之一,他在此时深切地体会到实业若能与民族精神结合,更能救国救民。在这个时候他更加认为学与术并重是正确的。

三、柏林大学与北京大学改革对世界的不同影响

柏林大学创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的榜样,更是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典范。它在高等教育史上成为继中世纪大学又一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史学家称:“柏林大学的创办像一个燃烧点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切光线全都从里面发出。”^{[5](P.169)}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也掀起了不小

的影响,它实际上是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发动了一场革命,是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以及学术思想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它不仅为当时中国大学教育树立新的楷模,而且促进了知识界思想的转变,为当时的五四运动提供了智力支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北大的改革是在借鉴德国大学的经验同时揉合多国的高等教育特长而进行的一场改革,它是在当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它远不可能开前人所未有,也不可能给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带来影响。实际上,当时十九世纪的德国,国家在实际上已变成了专门为民族利益而从事促进民族文化和推行民族理想的机构。国家的活动扩大到成为政治与教育的中介,在这一点上比当时的北京大学所处的大环境要优越的多。当时的北京大学处在国家并不支持蔡元培对北京大学改革的情况下,教育与政治、经济的联系只在于教育为其服务的功能上。而德国从开始筹办柏林大学起就是国家要以此来弥补德国在政治上的缺失。应该说柏林大学的建立,意义是十分巨大的。首先,改革消除了长期以来大学重要作用不断的衰退现象。大学以其服务于国家需要的宗旨,也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经过改革的大学,以崭新的面貌,赢得了普遍的赞许,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要求废除大学的呼声从此销声匿迹。其次,改革保证了国库对大学的拨款,尽管国家的资助经常是远非充裕的,但至少极大地提高了教授的待遇,使教授不必再从事第二职业,保证了大学正常的教学和科研职能,也吸引了有才能的青年从事学术工作。柏林大学这种创始于前的做法,促使国家对学校提供的经费增加,而其他国家相继追随于后,直至现在现代高等教育由国家主办,并提供大量经费都是受柏林大学的影响。再次,由于受国家资助,大学不再是完全自治的机构,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极大控制。虽然传统大学自治的制度在形式上得以保留,但校长、系主任、评议会和学院的权利和职责都减少了。大学的世俗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的成果和最明显的特征。正是科学研究以及教学和科研的统一,使德国成为近代大学最发达的国家,并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学究竟是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职能的教学机构,还是创造知识、探索真理的研究机构,这两种分别带有不同大学价值观的大学职能论有史以来就有冲突,但是洪堡创立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大学定位的难题。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柏林大学更是开前人所未有,这都不是北大改革可以比拟的。北京大学的改革必竟是在国家不太支持高等教育改革的情况下而艰难进行的改革,改革当然比起柏林大学来说显得极不彻底极不完善。同时,它对德国大学的极大程度上的模仿也限制了这种改革所应具有的创新力,它不能够推出新制度、新形式,而只能结合中国的情况加上一定程度的改良。在蔡元培动手整顿北京大学之前,中国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的,即使是维新派创建的京师大

学堂也只是空有近代大学之壳,而毫无形的一个“傀儡”学堂。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当中,中国人民的思想仍然带有极大的封建性,即使是民国的建立,也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形式变换。而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刚刚开始兴起,其影响力远远不够,北大改革之后发生的五四运动才真正意义上对民智起到了极大的冲击作用。因此,从思想上说,当时的中国虽然在时间上进入了近代,但是思想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

尤其是普通民众对近代思潮的真正含义理解不清,仍然抱着封建的东西过日子。而当时的德国由上至下,诸多的教育家、思想家、王公贵族都积极地宣传和接受新的思想的熏陶并将其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柏林大学的改革以及北大对其的仿造性的改革无疑是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 [1] 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2] 周天度.蔡元培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
- [3] 李其龙.洪堡.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 [4] 庄其真.为了完美的人格[J].外国高等教育研究,2004,(4).
- [5]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九卷)[M].

Think the Reform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Berlin University and Beijing University from Ideology of Running the University

CHEN J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Berlin University in Germany inherits the academic freedom and academic autonomy of the university in Middle Ages. It develops the idea further too. Especially the reform that Fee Sid, Schleyer agate Hertz and Wilhelm von Hum - boldt carried on in Berlin university brings far - reaching influence to the modern university of later age. That Cai Yuanpei imitates the mode of Germany university to reform Beijing University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The deep influence that view of Germany university puts on one of Beijing university brings the similar reform in the two university, but the difference of the two university is more obvious in several aspects. I attempt to explain the reformative difference in two universities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interpreting the idea of running an university, interpreting the emphasis points and difference about the idea of running an university and the different influence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I hope it can give us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Berlin University; Beijing University; Wilhelm von Hum - boldt; Cai Yuanpei; pure science; freedom of thought; all - embracing

(责任编辑 鲁 茗)